

周恩来论文艺



I206

7

周恩来论文艺

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封面设计：缪印堂

周恩来论文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46,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7 $\frac{1}{4}$ 插页1

1979年2月北京第1版 197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0

书号10019·2768

定价0.57元



目 录

我要说的话

——论鲁迅与郭沫若(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 (1)

延安的文艺活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 (8)

在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一九四六年
十月十九日) …… (10)

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
报告(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 …… (12)

一、三年人民解放战争 …… (13)

二、文艺方面的几个问题 …… (19)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
(一九五一年五月五日) …… (27)

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典礼上的
讲话(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 (31)

一、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 (35)

二、普及与提高 …… (38)

三、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 …… (40)

四、团结与改造 …… (45)

五、克服困难,迎接胜利 …… (47)

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一九五三

年九月二十三日).....	(50)
一、历史估价的问题	(50)
二、为谁服务的问题	(52)
三、深入实际生活的问题	(53)
四、提高艺术修养,努力艺术实践的问题	(54)
五、创作有正确思想内容的优秀的文艺作品的问题	(55)
六、帮助开展群众文艺活动的问题	(55)
七、文艺界的团结与改造问题	(56)
八、领导的责任问题	(56)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全国文联召集的

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七月

十四日).....	(58)
一、改革与“鸣放”	(58)
二、内行与外行	(59)
三、集体与个人	(59)
四、新生力量与创作	(60)
五、整风与自我批评	(60)

给程砚秋同志的信(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61)

我们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任务(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 (62)

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一九五九

年五月三日).....	(69)
-------------	--------

在庆祝新片展览月招待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日).....	(73)
-------------------	--------

关于文教工作计划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四日)	(76)
---------------------	--------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78)
引言	(78)
一、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	(83)
二、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	(86)
三、为谁服务的问题	(91)
四、文艺规律问题	(95)
五、遗产与创造问题	(98)
六、领导问题	(99)
七、话剧问题	(101)

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七日于紫光阁)	(104)
一、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	(104)
二、党如何领导戏剧电影工作	(108)
三、时代精神	(112)
四、典型人物	(114)
五、关于写人民内部矛盾	(117)
六、生活真实、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119)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于广州)···

一、关于知识分子和知识界的定义与地位	(122)
二、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	(125)
三、关于如何团结知识分子的问题	(136)
四、关于知识分子自我改造问题	(140)
五、几点希望	(142)

在文化艺术工作者春节联欢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三年

二月八日)	(144)
-------------	-------

要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九日)·····	(149)
一、对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五项基本要求 ·····	(149)
二、积极参加革命的阶级斗争 ·····	(156)
三、大力加强革命的文艺战线 ·····	(163)
在音乐舞蹈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六日)·····	(176)
一、关于文艺工作的方针问题 ·····	(179)
二、关于阶级性、战斗性、民族化、现代化问题 ·····	(179)
三、关于艺术作品的标准问题 ·····	(183)
四、关于创作的表现形式问题 ·····	(185)
在接见广东省现代戏会演的剧团负责人和主要	
演员时的讲话(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八日)·····	(188)
看《豹子湾战斗》后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189)
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	(194)
文化革命的任务(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二	
十二日)·····	(214)
接见乌兰牧骑时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217)
接见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的讲话(一九七三	
年一月一日)·····	(222)
编后记 ·····	(224)

我要说的话*

——论鲁迅与郭沫若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为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满二十五年，并庆祝他的五十生辰，我原打算写一篇专文献给他的。这个志愿立了好久，五个月前，我还拿了他的一部分著作，想在乡居期间，读他几本，然后好写出一篇有根据的文章来。不料今年夏天，敌机轰炸的次数特别多，人又病，事又忙，不仅文章没做，书也没读。时间是一天天地过去，书因为别人要读，也还了主人，可是，我的文章却依然没做。时间更一天天地逼紧，许多朋友的纪念诗文，也拿来读了，许多报纸的庆祝诗文，也提前发表了，于是使我志愿要做的文章几乎转成了急待偿还的文债。这一急，直临到郭老先生生辰的前夕。这一急，直临到纪念日特刊发稿的最后关头。可是我面前铺着的依然是一张白纸，打破了我一向做文的惯例，然而我却决不能以偿债的心情，来做献给郭先生的纪念文章。

* 这是周恩来同志为郭沫若同志五十生辰、创作生活二十五年而写的一篇纪念文章，发表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新华日报》上。《人物杂志》五一六期（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和《北方杂志》一卷五期（一九四六年十月）转登此文时，将原标题《我要说的话》改为《论鲁迅与郭沫若》。现恢复原标题，另添了副标题。

最后关头终于突破了，书既不能读，专文也不能写，但是临着这个日子，我却不愿“无言”，我还是说我平常所常说的活罢！

在朋友中间，在文坛上，通常喜欢将鲁迅和郭沫若相提并论。这原是一件好事，而且是应当做的事，可是有时候也成为多事。多事就是将无作有，将小作大，张冠李戴，歪曲事实，甚至分门别户，发展成为偏向，这便不应该了。

要并论鲁迅和郭沫若，我以为首先要弄明两人的时代背景和两人的经历，是多少有些不同的。

鲁迅的时代，是一半清朝，一半民国的时代。他出身于破产的士大夫家庭，他受过封建社会很深的洗礼，他受过戊戌政变后的洋务教育，嗣后留学东洋，又受教于章太炎先生，并参加了光复会。入民国后，他又做过多年北方官僚社会的小京官，也可说是闲差事。直到“五四”的前夜，他才得参加思想革命的运动，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从此以后，他就公开的成为宗法社会的逆子，士大夫阶级的叛徒，逐渐形成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可是他自己却又那样虔诚地愿意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瞿秋白同志说得好：“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 and 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所以，毛泽东同志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蔡子民先生也说：“为新文化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蔡元培：《鲁迅先生全集序》）鲁迅

所努力的，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坟》）这就是鲁迅为大众而牺牲的精神。他自己愿做“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同前），其实他就是这过渡时代的伟大的桥梁。

郭沫若的时代，却稍为异样了。他虽在少年时代，也是关在四川宗法社会里面的，但是二十岁以后，他走出夔门，几乎成为无羁绊的自由知识分子了，虽然他也如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过着贫困和流浪的生活。他的半商半读的家庭，虽也给他一些影响，但是三十年来大时代所给予他的影响，却有着异常不同的比重。就拿经历说，他既没有在清朝做过事，也没有去北洋政府任过职，一出手他就已经在“五四”前后。他的创作生活，是同着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他的事业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我们不能把郭沫若看成是前一辈子的人，而应看成是我们这一辈子的人，虽然他比鲁迅也不过只小了十一岁。我们也不能把郭沫若看成是两个时代的人物，而应看成是新文化时代的人物，虽然他在少年时代也曾舞文弄墨过一番。

因此，我说：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

到底的。

从这样观点出发，自然在并论鲁迅和郭沫若的时候，便不会发生不必要和不应有的牵连和误会了。

鲁迅先生在思想斗争和新文化运动上之非常可宝贵的革命传统，秋白同志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已经指出四点：第一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第二是“韧”的战斗，第三是反自由主义，第四是反虚伪的精神。这都是非常之对的，我在这里不想再说了。要说的是郭沫若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二十五年当中，所给予我的印象和我所认识的特点是些什么？

第一是丰富的革命热情。郭先生是革命的诗人，同时，又是革命的战士。他心中笔下充满着革命的愤火，也充满着对于人类的热爱。当“五四”觉醒时期，当创造社草创时期，他的革命热情的奔放，自然还带着很浓厚的浪漫谛克，这正是当时知识青年的典型代表。但是经过前一次大革命炉火的锻炼，经过十年海外的研究生活，他的革命热情已经受了革命理智的规范。然而，他内在的革命烈火，却决没有消失，相反的，愈蕴藏便愈丰富。一旦抗战号响，他便奔回祖国，他的革命热情，也就重新爆发出来了。四年多抗战，不论在他的著作上，在他的行动上，都可看出郭沫若仍然是充满着革命热力，保有着当年热情的郭沫若。可是时代究竟不同了，客观的事实不断地教训着我们充满了革命热情的郭先生，于是郭先生有时竟沉默起来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久已代替了革命的浪漫谛克主义，郭先生已到“炉火纯青”的时候了。

第二是深邃的研究精神。有人说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不能兼而为之。其实，这在中国也是过时代的话，郭先生就是兼

而为之的人。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他的海外十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十年内，他的译著之富，人所难及。他精研古代社会，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两周金文以及古代铭刻等等，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了古代的许多真实。这是一种新的努力，也是革命的努力，虽然有些论据，还值得推敲。如果说，连卢那察尔斯基都不免在退潮时期入了迷路，那我们的郭先生却正确地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的研究的道路。现在郭先生似乎又清闲了，恰好为纪念他的二十五年创作生活，大家主张集资建立沫若研究所，我想，这是最好不过的事。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现在是时候了。

第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郭先生是富于战斗性的，不仅在北伐抗战两个伟大时代，郭先生是站在战斗的前线，号召全国军民，反对北洋军阀，反对日本强盗和逆伪的；便在二十五年的文化生活中，郭先生也常常以斗士的姿态出现的。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成为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也正因为这样，初期创造社才能为革命文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才影响了后期创造社在思想意识上的一些论争。自然后期创造社的争论已多少表现着“文人的小集团主义”（秋白语），可是鲁迅先生也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艺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以纠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

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同时这里必须为周郭两先生辩白的,他们在北伐期中,谁都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而且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事实。周先生在《两地书》(六九)中明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在广州发表的文学家宣言,周郭两先生均列了名的。广州事件后,郭先生曾邀鲁迅先生参加创造刊物,列名发表宣言,不幸因新从日本归来的分子的反联合,遂致合而复分,引起了后来数年两种倾向斗争的发展。这从“切磋”的观点上看来,未尝不是一件有收获的事,但是,因此而引起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无聊的纠葛,一直影响到在鲁迅晚年时候的争论,那真是不应该的了。有人说,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多表现在他的著作上,郭先生的战斗性多表现在他的政治生活上。我想,这种分法,并不尽当的。因为一个人的战斗性是发源于他的思想性格和素养的,文字和行为,不过是他的表现的方面罢了,并不能说这是差别的所在。真正的差别是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较任何人都持久、都有恒,这是连郭先生都会感到要加以发扬的。

这些,也就是郭先生在革命的文化生活中最值得提出的三点,也就是最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三点。

我这不是故意要将鲁迅拿来与郭沫若并论,而是要说明鲁迅是鲁迅,郭沫若是郭沫若,“各人自有千秋”。

鲁迅先生死了,鲁迅的方向就是大家的方向!

郭沫若先生今尚健在,五十岁仅仅半百,决不能称老,抗战需要他的热情、研究和战斗,他的前途还很远大,光明也正

照耀着他。我祝他前进，永远地前进，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

延安的文艺活动*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延安文艺活动，大约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是抗战初期，那时各方面的作家，许多到延安去了，产生了许多反映适合抗战初期的作品；到后来中间一个时期，没有产生什么作品；最近两年多来，又蓬蓬勃勃起来了。原因是这样的：初期因为从各方面来的作家，经历了抗战初期民族抗战的那种热潮，所以有许多作品写出来。中间一个时期，因为作家在延安住了一个时期，延安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性质上还是农村环境，社会活动比较少，大家忙于生产，生活很紧张，但也单纯，没有什么复杂曲折的生活，因此这时期作品产生较少。第三个时期，一方面因为经过了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即整风），其次是生产运动，后者是物质基础，人民对于文化的要求增多了。许多作家过去对于城市生活人物比较有把握去表现，憎爱也极分明。所以对旧社会的认识很深，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如曹禺先生的《日出》、《北京人》这样的作品。但到延安不同了，这是新社

* 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在重庆张家花园举行会员联欢晚会。晚会由老舍主持，到会者有郭沫若、叶圣陶、巴金、冯雪峰等五六十人。周恩来同志被邀请去讲话。这是讲话摘要，载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新华日报》。

会，熟悉城市的作家，对农村环境就不一定熟悉了。许多就从城里走到乡村，走到广大的农民中去，并且生活在他们中间，因此发现了深厚的民间艺术源泉，如秧歌舞等等，中国的新歌剧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话剧也要吸收这个形式的优良因素。现在又是一个新的时期到了，延安的作家，又大批的到收复区去，去深入生活。我到重庆来以前，就送走了一百多位文艺工作者，其中有作家、诗人、木刻家、音乐家、演员等等。重庆的作家、朋友，在目前也是在新的时期中，求得更大的发展，驰骋的地方也多了，今后一定会有更大的成绩的。